



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中国城。

婚恋观：“我以为结婚是人生终身的问题，需要侦查其女子是否受过教育，品格端正而知妇道是紧要的。贫富不成问题。”

等到1959年，古巴发生了改变国家进程的大事件——古巴革命胜利。新政府成立后，开始实行一系列国有化政策，华侨们的日子开始一天天难做起来。作为华裔一员，黄宝世自然不会独善其身。他在当年四月初三的家书中写道：“三月初八的来信，内夹您母亲手札及照片，一齐收妥了，祈勿念。同时知道您在家平安康健，我觉得无限快慰。……今又遇古巴新政府成立，施行国家主义，同时竟向工商界加重税捐，连实业暂时冰结，未许出卖。”

黄卓才告诉本刊，父亲只读过三年书，但他刻苦自学，见多识广，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素养，又受西洋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理念的影响。“他的来信一般比较短，言简意赅，我一定会反复阅读。他用‘您’与我对话，表达了对儿子的特别信任和尊重。”

除了情感上的联系，黄宝世的家书同时还是银、信合一的侨批。1958年黄卓才和母亲搬进了广州的新家，买房的钱来自父亲的侨汇。李月娟的父亲同样如此，他苦心经营自己的蔬菜摊，常年寄钱回国，接济老家亲人。一笔笔跨越大洋的古巴侨汇，是许多个家庭的经济命脉。

时间来到1964年。在前述家书中提到的“在家身体多病”的黄母，在这一年不幸因病逝世。等到黄宝世接到儿子来信，已是次年正月初九。第二天，父亲提笔给黄卓才回信。

在这一封信中，平常较为惜字的父亲，在信中流露出不一样的心情。他表达了得知妻子病逝的伤心，也担忧儿子未来的生活。在结尾处，黄宝世照旧告诉儿子，自己身体康健，请勿远念。但是，他又比往常多写了几句话：“同时希望你们勿因

此事而伤心。人生终有一别。您要向着未来前途迈进，调整快乐家庭，是所愿望。”

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古巴政府开始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，许多奋斗一生的华人遭遇重大打击。受时局影响，古巴华人纷纷考虑回国，或去往他国。华人社团同时走向衰落。1961年，哈瓦那的华人社团尚有37个，而到了1984年，除中华总会馆，当地华人社团锐减至14个。

在黄宝世的家书中，他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提及回国与家人团聚事宜，但始终未能成行。黄卓才告诉记者，他认为父亲未能回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：1959年以前，古巴生意红火，正是赚钱汇款养家良机；父亲被选为中华会馆大萨瓜分馆主席，会馆事务也放不下；等候货船空位回国期间，父亲总是相信自己身体还好，多次把名额让给急需回国的侨胞。

1975年4月22日，黄宝世在家书结尾再次告诉儿子，目前身体安好，勿远念。但是一个多月后的6月2日，他病逝于大萨瓜。在采访中黄卓才表示，当年敢从中国远赴古巴的人，都很勇敢，有冒险精神。他们爱国爱乡，有家国情怀，是世界华侨史上的楷模。

仍念中国心

1984年，中古两国逐步恢复双边交流；1989年，两国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。尽管赴古巴的华人远远少于往日，但古巴的华人社团迎来久违的活跃气息。

薛淇心在研究中指出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与古巴越发密切友好的双边往来，以及中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，为哈瓦那华人社团乃至整个古巴华人社会的复兴提供了推动力。在此背景下，哈瓦那的华人社团采取多种手段吸纳华裔会员，并重新开始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，包括庆祝中国农历新年、组织会员进行清明祭祀、庆祝华人抵古纪念日等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在古巴尚存13个华人社团。

一些老一辈华人的族群意识，在上述过程中被激活。同李月娟访谈的过程中，薛淇心发现这位老人总是拿着一些中文旧报刊，反复阅读。对此李月娟的回答是：“我不是在看新闻，我只是通过看这上面的字让我不要忘记中文，我年纪大了，平时也用不到中文，如果不这样每天看一点，我很快都要忘记了。”